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上册

刘培华

复旦大学图书馆
藏书之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上册

刘培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26千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统一书号：3209·15 定价：2.25元

前 言

这部《近代中外关系史》，原是我在讲授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时，应教学的需要，给学生写的讲义，很不成熟。实际上，只是对一些有关材料的整理，还谈不上揭示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规律。现在让它同读者见面，一是想借以抛砖引玉，二是向专家和读者就教。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中外国家之间的关系。书中吸收了国内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某些尚有争议的问题，因限于篇幅，或选取一说，或迳申管见。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程道德、饶戈平二同志的大力协助。书稿打印出来以后，又承张振鹏、宓汝成、刘存宽、谢承仁等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得以减少一些错误。我的老师王铁崖教授则自始至终给予关怀、指导。谨此表示衷心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其中观点错误，取材不当，繁简失宜，语句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深望前辈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 培 华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绪论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概况	(1)
第一节 古代中外关系的基本线索.....	(1)
第二节 西欧殖民势力的东侵和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	(16)
第三节 沙皇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侵夺.....	(28)
第四节 十八世纪前后中英关系的发展.....	(42)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的中外关系	(55)
第一节 英国的侵华活动和林则徐领导的反侵略斗争.....	(57)
第二节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清朝政府应变的因循措施.....	(71)
第三节 西方列强胁迫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89)
第四节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103)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119)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胜利时期的中外关系.....	(121)
第二节 西方列强的“修约交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36)
第三节 侵略战争扩大和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56)
第四节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177)
第三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外关系的新变化及其特点	(193)
第一节 西方列强在华实行所谓“合作政策”——特点之一.....	(195)
第二节 清朝政府对外采取“抚夷”的基本方针——特点之二.....	(214)

第三节	中国人民开展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侵略斗争——特点之三·····	(230)
第四章	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249)
第一节	我国边疆地区普遍危机的开始·····	(251)
第二节	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谈判·····	(272)
第三节	中日关于琉球和朝鲜问题的交涉·····	(292)
第四节	法国加紧侵略西南边疆及其发动的中法战争·····	(308)
第五章	中法战争以后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329)
第一节	列强对中国滇粤沿边侵略的继续扩大·····	(331)
第二节	英国窥伺西藏及其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	(346)
第三节	列强在朝鲜的争夺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362)
第四节	清朝政府的消极应战和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	(381)

绪论 鸦片战争以前的 中外关系概况

第一节 古代中外关系的基本线索

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是世界上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古代起，直到清朝中叶，中国一直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大国家。

古代中国同外国的接触和交往，很早就已开始，其历史悠久，事例繁多。在这里，仅将其中比较突出、影响深远的一些史实，扼要地简略提及。

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中国同四邻的亚洲国家和民族交往最早，接触也最为频繁。周朝初年的“箕子朝鲜”^①；周穆王西巡至昆仑，会见西王母，葱岭左近各国来朝^②；徐福等奉秦始皇之命，带领三千童男女漂渡东海，寻求“不死之药”，留居日本岛

① 箕子，商纣诸父，名胥余，为太师，封子爵，国于箕，故称箕子。根据《后汉书》第一百一十五卷《东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克殷之后，“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传四十余世。至公元前194年，始为燕人卫满所代。

② 关于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在《穆天子传》、《周逸书·王会解》及《竹书纪年》中，皆有所载。

上等一些古代传说^①，姑且不谈。仅就可靠历史记载，从汉朝开始，中国与东方和西方各国的接触和交往，即已史不绝书。其中为时最早、影响最大的对外活动，首推张骞的“凿空西域”^②。

张骞，西汉成固人，约出生于汉文帝后期。武帝继位初年，张骞担任“郎”的职务，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从。汉武帝为了联合当时徙居于妫水（即今苏联境内的阿姆河）流域而与匈奴为世仇的大月氏（音肉支），共同抗击匈奴，以解除对汉朝北部边疆的威胁，遂决定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往大月氏进行谈判。

公元前一三九年，张骞率领着一百多人的使团，踏上了前往大月氏的漫长征途。不意在路经“河西走廊”^③时，被匈奴的巡逻骑兵捕获，押往蒙古的匈奴王庭，拘留了十年。张骞在留居匈奴期间，虽已娶妻生子，但仍矢志不移，不忘汉武帝所授使命，时刻准备设法脱走。公元前一二九年，他终于乘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机会，冒着万险，率众逃出匈奴人所控制的地区，继续西行。他们先取道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的车师，进入焉耆，再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音鸠支，今库车县）、疏勒（今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位于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

大宛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富饶，想同汉朝交往，只因山川险阻，“欲通不得”^④。今见汉使前来，不禁喜出望外。他热诚地询问张骞出使的目的，张骞说明要去大月氏的计划，希望能够帮助送他前往。大宛国王欣然同意派遣译员和向导，把张骞一行送到居住在今苏联乌兹别克一带的康居。康居国王又派人把张骞等

① 徐福，即徐市（音弗），秦方士。他与方士韩众（亦作韩终）奉命带人由山东渡海求仙，为秦始皇寻取“不死之药”的传说，在正史里也有反映。例如，《史记·秦始皇纪》有：“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汉书·郊祀志》有：“始皇遣徐福、韩众之属，入海求神采药”。

② 《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大宛传”。

③ “河西走廊”，亦称甘肃走廊，在今甘肃省西北部，即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一带，以其在黄河以西而得名，是长安前往西域的通道。

④ 《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大宛传”。

人护送到了大月氏^①。

但是，等到张骞到达大月氏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月氏在迁到妫水流域之后，又征服了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由于这一带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很少受到外来敌人的侵扰，他们已由游牧生活开始转为定居，不愿再同匈奴打仗。所以，汉朝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张骞等就渡过妫水，途经大夏，踏上了回汉的归路。他们翻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东行，过莎车、于阗（今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进入羌人居住的地区。不意在此再度为匈奴的巡逻骑兵俘获，又被扣留了一年多。等到公元前一二六年张骞返抵长安时，同行一百多人，大都死于旅途。最后随他一同回到汉朝的，只剩下堂邑氏甘父一人。

张骞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能够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政治使命，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亚洲历史，特别是东西交通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早于先秦时代就在经济文化上有所往来，并且对西域的某些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作为官方的正式使节，张骞和他的随从人员则是第一次开通西域的有功之臣。他们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的要道，开辟了至今仍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张骞亲自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许多地方，并且从传闻中了解到乌孙（在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奄蔡（在里海、咸海一带）、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西汉时称大食为条支，在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身（音元）毒（即今印度）等地的许多情况。^②由于张骞从西域带回了有关中国新疆和西南亚广大地区的丰富知识和大量见闻，大大开阔了汉族人民的地理视野，从而使人们获得了许

① 《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大宛传”。

② 《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大宛传”。

多新的知识。这就为进一步发展中国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沟通国际间的友好往来，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西汉朝廷为了表彰张骞的卓越功绩，于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二三年，汉武帝赐封张骞为博望侯。^①

为了进一步发展汉朝同西域各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广泛联系中亚、西亚各国，孤立和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汉武帝决定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当时的强国乌孙。公元前一一九年，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各备好马两匹，并携带价值上亿钱的金银、珠宝、丝绸等贵重货物和一万多头牛羊，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②

张骞到了乌孙以后，一面亲自同乌孙国王谈判，一面派遣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通聘。后因乌孙国内部有事，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问题，一直迟迟定不下来。于是，张骞决定自己先回汉朝。临行，乌孙国王特意派遣使者数十人，带着当地所产良马数十匹，以及译员、向导等，跟随张骞一起前来汉朝答谢。^③公元前一一五年，张骞返抵长安。其后不久，他派往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的副使，也分别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相继回到长安。从此，“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④。汉朝同西亚及南亚各国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中外学者，有的把张骞通西域同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有的把张骞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⑤。尽管这种类比未必恰当，但是，它却表明了张骞在历史

① 《汉书》第六十一卷，“张骞传”。

②③ 《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大宛传”。

④ 《汉书》第六十一卷，“张骞传”。

⑤ 大卫·利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年)，英国传教士和旅行家。他受伦敦传道会的派遣，从1849年起旅行非洲，曾由大西洋海岸横穿非洲，到达印度洋海岸。

上的杰出贡献，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东汉明帝永平（公元五十八——七十五年）年间，汉朝北征匈奴之后，班超再次经营西域的光辉事迹，也是东西交通史上的重要篇章。①根据史书记载，班超经略西域，出任都护，“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②。嗣以班超经略西域有功，被东汉朝廷晋封为定远侯。这个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张骞所传闻的黎轩（即犁轩）就是大秦③了。公元九十七年，即永元九年，班超命部将甘英遍历西域诸国，经安息、条支，前往大秦通聘。④

当时，东汉同波斯一带的往来已经畅通无阻，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在公元前后两世纪时，安息的国势很强，西亚诸国，大都为其臣属。中国同西方的交往通商，尤其是丝绸贸易，大都为安息所垄断。它为了长期居间独占中国的丝绸贸易，不愿中国和欧洲国家直接交往。故而当甘英拟从条支渡地中海前往大秦时，安息使人以渡海艰险为词，多方劝阻，致使甘英未能到达大秦。

公元一六六年，即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人来到了汉朝。据《后汉书》记载，当时有一个自称为大秦王安敦所遣的使者，前来汉朝通聘，并且“呈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物。⑤据近人考证，所谓安敦，就是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us）。中国与西方罗马属国从海道直接交往，始于此

① 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兴平）人。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命出使西域，首先赶走匈奴势力，恢复鄯善、于阗、疏勒同汉朝的关系；后又击败龟兹、焉耆等国，担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他在西域活动了三十二年，使西域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贵族的奴役，并且恢复了中西交通的道路。班超经略西域的事迹，见《后汉书》第七十七卷，“班超传”及第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传”。

② 《后汉书》第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传”。

③ 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据近人考证，黎轩即罗马帝国所属的埃及亚历山大城。

④ 《后汉书》第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传”。

⑤ 《后汉书》第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传”。

时。公元二二六年，即三国孙吴大帝黄武五年，又有一位名叫秦论的大秦商人来到交趾（今越南北部）。交趾太守吴邈遣人把他送至建业（今南京），谒见吴大帝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①公元二八四年，即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大秦又遣使者来与中国通好。由此可见，在东汉时，中国与大秦的交往确已开始。至于中国的丝绸，早于西汉时期，甚至在此以前就已传入罗马，这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的罗马诗人贺拉西（Horace）留下来的有关丝的记载，足资说明；而罗马的琉璃制品，当时也已传到中国，这可由汉朝的妇女已有用琉璃制品作耳饰的事实，得到佐证。

中国与亚洲邻国的接触和交往，早在远古就已开始。其中关于中国与朝鲜、越南、缅甸的关系，因为彼此山水相连，千里接壤，自古以来，双方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都比较密切。到了汉朝，中国同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的政治交往，也逐渐开始频繁起来。在此以后，不仅政府之间彼此经常相互聘问，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亦出现了崭新的情况。在这里，仅将有关法显的出游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事，简要地加以介绍。

法显（约公元三三七——四二二年），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三岁时便出家度为沙弥（和尚），为我国古代的著名高僧。他为了进一步深研佛法，公元三九九年，也就是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偕同道僧人慧景、道整等十人，前往天竺取经。“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先后访问了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凡所经历，三十余国”。^②至四一三年回国，历时十四年。他根据旅途见闻所写的《佛国记》（亦称《法显传》或《游历天竺记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文献和历史文献，字数虽然不满一万，但却精练地记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西亚、南亚和

① 《南史》第七十八卷，“夷貊上·海南诸国”；《梁书》第五十四卷，“诸夷·海南”。

② 《高僧传》第三卷，“宋江陵辛寺法显”。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经济生活、宗教文化和典章制度，为研究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及其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此外，他还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等大量佛学经典著作，从而使佛教文化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法显的出游，对于加强中国同西亚、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古代中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异常重大的贡献。^①

日本是中国的东邻，彼此隔海相望，在历史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大多是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不断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远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流传着许多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接触的故事。但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则是汉武帝时期彼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事迹。当时，中国通过朝鲜同日本的三十多个小国进行接触。

公元五十七年，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邪马台国大倭王正式派遣使者，到东汉首都洛阳“奉献朝贺”，进行聘问。汉光武帝“赐以印绶”，其印文为“汉委奴国王”。^②（此印原已失传，一七八四年，复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叶崎村出土）公元一〇七年，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六十人”。^③公元二三八年，也就是三国曹魏明帝景初二年，倭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并赐以锦绢、铜镜、宝刀、真珠等物。^④

四世纪中叶，日本大和王朝的领地扩大到了九州，不久它就遣使到东晋聘问，呈进方物。在南北朝时期，中日之间的使节往来更多了。公元四二五年，即刘宋文帝元嘉二年，倭王赞“遣司

① 法显出国游学的事迹，可以参阅他写的《佛国记》（明刻本）。

② 《后汉书》第一百一十五卷，“东夷列传”。

③ 《后汉书》第一百一十五卷，“东夷列传”。

④ 《三国志》第三十卷，“魏书·东夷传”。

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元嘉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文帝封济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授其承袭“安东将军、倭国王”位。^①嗣历齐、梁之世，使节往还不绝。

由于日本早在三国时代就同孙吴之间的民间往来频繁，故而沿称南朝的宋、齐、梁、陈为“吴”。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载，在南朝时，中国人到日本去的已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当时，中国人在日本有特定的居留地，称为“吴原”。日本史籍所称的“秦人”和“汉人”，早已由朝鲜半岛不断地移入日本。这些人都是当时日本社会所欢迎的有技艺的人。例如，有些“汉人”就以织绢的优越技术取得了“绫人”的称号。此后更有不少的中国陶工、画工、鞍匠，从朝鲜移居日本。

到了隋、唐时代，中日之间的交往，就更进一步地频繁起来。自从公元六〇七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带领留学生使隋及次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访问了日本^②之后，在隋、唐两代，中、日两国互派使节往还多达二十余次。日本遣使来华，并非单纯基于政治目的，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和吸取中国文化。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师，并有众多的留学生同行。有时，一次到长安来的使者竟多达五六百人。这些使者，对于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甚至有些日本留学生，学成之后，留在唐朝工作，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例如，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麻吕，改用汉名晁衡，在唐供职长达四十余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③晁衡对于汉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同中国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有深厚的友谊，并且留下了许多很好的诗篇。^④

① 《宋书》第九十七卷，“夷蛮”。

② 《隋书》第八十一卷，“东夷·倭国”。

③ 《新唐书》第二百二十卷，“东夷·日本”。

④ 可参阅《李太白全集》和《全唐诗》第一百二十七卷中的有关诗篇。

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学习数年，多的有二十年和三十年不等。他们的生活起居习染唐风，回国后也就自然而然的传播于日本。隋末来华至唐初回国的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日旻、舒明、南渊清安等人，把唐朝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介绍回国，从而推动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①

日本僧侣到中国来的也很多。每次使团来华，都有一些僧人同行。他们留住中国时间久的往往二十余年，甚至有的长达四十多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高宗时的智通、智达，他们在长安跟中国著名高僧玄奘学习，归国后广为传播。日本僧人在中国不仅学习佛法，也经常注意学习唐朝的一般文化，他们回国时，往往带回大量的典籍、碑帖和诗文著作。

唐玄宗时，扬州龙兴寺的著名高僧鉴真（六八八——七六三年，姓淳于，扬州江阴人），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于公元七五四年带着大批经卷、佛象、文物、典籍，渡海赴日，讲经授法，并且依照唐朝寺院的格式，在日本修建唐招提寺，从而使日本佛教界发生了重大变化。^②

鉴真的东渡，在形式上虽然是一个僧团组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规模完整的文化技术顾问团。据《东征传》^③记载，鉴真不仅带有大量各种科学技术文化典籍，并且还带去了各方面的专家。例如，在跟随鉴真赴日的人员里，就有善于雕刻、塑造的，精于铸造、建筑的，擅长绘画、书法的，深通医药、农作的。他们把当时的唐代文明全面地介绍到日本去，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

① 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的一次著名的政治、经济改革。公元六四五年，以藤原镰足和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革新派，推翻当政的豪族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即位，改元大化，颁布革新诏令，实施新政，打破了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从而使奴隶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制社会。

② 鉴真东渡日本传播戒律的事迹，可参阅《宋高僧传》第十四卷，“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

③ 《东征传》，即《唐大和尚东征传》，是日本古代学者淡海三船（又称真人元开）根据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鉴真和尚传》编写的。公元779年成书，其中详细地记述了鉴真等人东渡日本的事迹。

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汉文字也传到了日本。根据史书记载，日本在奈良朝（七一〇——七九四年）以前，一般只用汉文。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十七年，研习中国经史、文字，后来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兵器归国，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日本有本民族文字字母之始。平安朝（七九四——一一九二年）时的留学生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成“平假名”，从而使日文字母进一步完备起来。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的学术对日本也有颇大的影响。日本仿照长安的規制，先后修建了平城京和平安京，并且仿照唐朝制度创办大学，招收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学术。留唐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讲席，传授中国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从而使中国学术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此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如天文、历法、算术、史学、诗词、散文、小说、书法、音乐、舞蹈等等，也都相继传入日本。中、日两国的这种密切往来关系，经历五代战乱以迄宋、元而不衰。

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盛唐时代，东西方各国到长安来贸易和学习的商人及知识分子，摩肩接踵，比比皆是。唐朝的声名远播至地中海岸，远近来聘的多达四十余国。

盛唐时代的宗教事业也很兴盛。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奖掖之下，首都长安及全国各地寺庙林立，中外僧人的宗教交往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对中外关系影响最大的为佛教高僧玄奘的出国游学及基督教教士阿罗本（Alopeno）的入唐布道。

唐僧玄奘（六〇二——六六四年），姓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他为了求取释氏经典著作，深研如来佛法，于公元六二八年越过葱岭，先后到达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地游学。在古代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跋

山涉水，途经万险，历时十七年，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在出访期间，一面研习佛理，一面讲学授法，在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回国以后，他就开始紧张的译著工作。除了组织人力翻译佛教经论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此外，玄奘还根据唐太宗的要求，写出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在这部著作里，记载了他亲身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地理形势、宗教、风俗、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很多古代印度史料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世界著名的古代历史、地理著作。玄奘的思想影响远及日本、朝鲜等国。他的出游，对增进中国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阿罗本，叙利亚人（当时称为大秦国人）。公元六三五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他率领教士数人携带经籍，到达唐朝首都长安，把基督教传到了中国。关于他的事迹，一六二五年，也就是明熹宗天启五年，在长安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碑文提到，当阿罗本抵达长安时，唐太宗曾命宰臣房玄龄亲至城郊宾迎，然后居于大内。太宗既命译释经文，且又不时垂询教理。^②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即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us）。阿罗本到了长安之后不久，即奉钦准，开始传教。由于得到唐太宗的保护和鼓励，一时唐人入教的甚多。此后二百年间，景教盛行于中国一百多个城市，教徒人数众多，几乎遍及南北各省，甚至玄宗时的著名将领郭子仪也皈依入教。但于九世纪中叶武宗会昌（八四一——八四六年）年间禁教以

① 关于玄奘西行游学的事迹，可以参阅：一、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二、道宣著：《续高僧传》第四卷《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第五卷“玄奘传之余”；三、玄奘口述，辩机笔录：《大唐西域记》。

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上载：“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于殿，问道禁闱。”（见西安碑林展室原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后，便逐渐衰败下来。待到公元十世纪前后，殆几泯没无存。^①

然在中亚游牧的鞑靼人中间，景教仍然继续广泛传播。当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入主中国时，景教徒重新获得了发展，并且进一步兴盛起来，忽必烈对基督教，同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一样，一视同仁。一二八九年，他还在政府里专设了一个掌管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②这时在大都（今北京）和宁夏都设有主教区。仅就中国的一个维吾尔人雅巴拉哈三世，在巴格达任教务大总管达三十六年之久一事，即可推知当时景教昌盛和势力广被的情景。但在十三世纪之后，由于景教迁就其他宗教和哲学体系，其势再度逐渐衰败下去。

当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前夕而正树声威于中亚的时候，天主教传教士几度试图由陆路至中国而未果。其中圣芳济会（St. Franciscan）传教士皮阿诺·卡皮尼（Jeu du Plau de Carpini）和基洛姆·鲁布鲁基（William of Rubruick）二人，曾在十三世纪中叶先后到达喀拉和林或其附近的蒙古王庭，但未能抵达中国。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olo Polo）和马费奥·波罗（Mafeo Polo）兄弟，是这两个教士的同时代人，他们大约在一二六五年抵达忽必烈的朝廷。忽必烈因为敬慕他们的才智和人品，想借西方文明来教化自己的粗野的追随者，于是派他们返回欧洲，带信给教皇，要求教皇派遣一百名能够传授宗教和科学真理的教士到元朝来。怎奈教皇只派出了两名教士，并且由于这两个教士害怕旅途艰险，他们跟随尼科洛·波罗等人刚刚上路不远，就又转回去了。而随同威尼斯商人两兄弟东来的马可·波罗

① 景教流行中国的情况，可以参阅：一、《金石录补》第十七卷“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二、向达著：《中西交通史》第三章“景教与也里可温教”。

② 元朝初年的基督教，并不止于景教一派，当时尚有他派在华布道；但元朝人不加分别，统称之为“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元朝政府原设有管理佛教的宣政院和管理道教的集贤院；后来，由于景教的发展和兴盛，遂又设立了专管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